

中国大学的社会信任基础研究

——基于陇中二百户村的观察与阐释

张 清◎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学的社会信任基础研究

——基于陇中二百户村的观察与阐释

张 清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学的社会信任基础研究:基于陇中二百户村的观察与阐释 / 张清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650-0588-6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高等学校—舆论—社会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6032 号

中国大学的社会信任基础研究

——基于陇中二百户村的观察与阐释

张 清 著

策划:兰亭工作室

责任编辑 罗季重 方立松 王 磊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13.25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243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工业大学印刷厂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588-6

定价: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信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关系结构,它是主体基于自身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交往经验所形成的判断与行为。因此,信任能够以人的内心活动的一种形式——态度表现出来。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相应的信任行为来,而此类信任行为则是为人所能见到的社会事实。我国大众与我国大学之间的社会交往从近代大学产生时开始,长期以来人们认同大学并与之交往的历史过程会赓续和嵌入到当前人们对大学的认同、信任与合作的过程当中。其中引导人们认同与信任大学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人们司空见惯并熟视无睹。对于每个人来说与大学交往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人们对这一过程如此熟悉以致被人们当作常识和惯例来看待。将这个使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论题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野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论题。另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人们与大学间的交往关系实际上也表现出了足以引起我们关注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如一些地方特别是乡村已重现“上大学无用论”,另一些地方则更甚,近两年则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学生放弃高考的现象等。我的学生张清独辟蹊径欲从大学的社会信任入手来努力解释这些现象。但他遇到的问题是,人们向大学供给的信任不是同质的,人们的信任意愿与水平是各不相同、程度不一的,信任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个人方面来说,其主观意识、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可以作为向大学提供信任的显著变量;从社会环境、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来说,社会心理、制度规则、信仰文化、历史传统等也在宏观方面影响着人们向大学提供的信任;从人们与大学交往的实际涉入程度来说,个人从大学获益的情形各不相同,会造成其认同与信任大学的形态各异,这意味着不同的个体与大学的实际交往与获益情况也是影响其向大学供给信任的

权变因素。这些情况是探究大学信任问题的难点所在。为此,张清选择了甘肃省中部地区一个村庄做田野研究,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来探究人们的大学信任状况与信任所依赖的基础。

该书首先从问题的原初开发,探究了村民与大学交往的形态。封闭乡村的村民们是通过间接渠道获得大学信息,他们一生只能依此来想象处于千里之外的大学;其次,书中以案例方式认真细致地呈现村民们对大学信任的真实状态;随后,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找寻村民们信任大学所依赖的传统基础。作者基于这些研究过程敏锐地发现,近年来随着国家管理大学的各种制度、政策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变更,使村民与大学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了。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村民们所仰赖的传统大学信任基础被改变了。但是,人们仍然依照他们所熟悉的传统信任基础来向大学供给信任,这种情形造成了人们对大学信任的传统基础的固守与现实变化之间的错位情况。尽管信任错位并未显著地影响到人们向大学供给信任,但是信任错位给乡村家长与学生所带来的内心失望与情感伤害却是明显的,而且其间也出现了大学信任迟疑的一些个案。由信任错位所引起的失望与信任迟疑应该受到社会关注,因为它会影响到人们与大学合作意愿的强度,更为甚者确实可以诱致“读书无用论”的产生。为此,该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其中的一些建议可作为大学和政府做决策时的参考依据。

费孝通先生曾倡导,要研究中国社会,首先得研究中国的乡村。本书在成书前,张清到甘肃贫困乡村生活近一年时间,坚持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在一起,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村民,融入乡村生活,体验村民的生活,并站在村民的立场体味大学对与他们的意义。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清承受了许多劳顿之苦,付出了辛勤汗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为自己的学生能将目光抵及社会底层、在社会生活的一线探寻问题的研究取向,踏实而严谨的研究作风而感动。予嘉其行,略陈所感,权作序言。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国庆

目 录

序	I
绪	1
第一章 大学信任研究的理论基础	17
一、信任研究的理路与信任概念	17
二、大学信任的厘定	26
三、信任基础及其特点	29
四、大学信任基础	33
第二章 乡村生活与想象中的大学	36
一、二户村概貌	37
二、调查思路与调查对象的选择	48
三、想象中的大学	53
第三章 村民的大学信任状况及其微观基础	69
一、大学信任状况的分类考察	70
二、大学信任的微观基础	96
三、村民的大学信任实质	104

第四章 村民大学信任的制度之维	107
一、制度与大学信任	108
二、制度变迁与村民的大学信任	123
第五章 村民的大学信任：乡村信仰文化的型塑	136
一、村民的宗教信仰与大学信任	137
二、村民的祖先信仰与大学信任	146
第六章 村民的大学信任：历史深处的记忆	152
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社会认同	153
二、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及其社会信任	163
三、历史的记忆影响村民认知大学的图式	172
第七章 错位的大学信任	175
一、大学信任关系中的吊诡	175
二、大学信任的错位及其后果	182
第八章 结论与问题回应	185
一、基本结论	185
二、对问题的回应与建议	190
主要参考文献	201

一、中国大学的社会信任：问题的缘起

大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落脚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是横向移植而非纵向继承的结果。金耀基先生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现代大学不是由帝国时代的太学、国子监承接过来的，则是随着西潮之东来，自欧洲移植于中土者。”^①诚如斯言，中国大学既然是一种外来的系统，它不可能瞬间就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众所周知，大学自晚清以来渐次出现在中国后，又历经百余年发展与演变才步入到当代社会。若要了解中国大学的发展状况，我们翻开现有的经典大学史，都可以见到对于中国大学发展的翔实记载，但我们遍寻这些相关的文献时就会发现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叙述惯例，那就是从国家或者其他建制大学的人或组织的立场来告白关于大学发展的诸多方面，通常将大学设定为具有非常明晰的发展路径作为前提来铺陈的，并以一种苍白或冷静的眼光描述大学的发展过程。这样书写大学发展的方式是单调和不完全的。因为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与大学息息相关的大众对大学的感受及其声音却被忽视了。大学日常与社会大众存在须臾难离的、不可隔断的社会联系，因为最起码大学里培养的学生全都是来自于大众，大学的资源也要从社会源源不断地获取。在这种联系当中，当大众承担起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大学去作学生的家长角色时难道没有理由会产生对大学的一丁点的观感吗？现有的大学史却很少顾及大众对大学的感受及记录他们在其间的“一声叹息”，仿佛大学从来对大众来说就是一种宿命的承受。

因此可以说，我们所依赖的多数有关大学发展的叙述、记载从来就是没有考

^①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北京：三联书店，2008：1

虑到大众在大学生成、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对大学所持有的态度和其他诸多情感。实际上一方面大众对大学的心态具有对大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人尚要以人为镜,况且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大学乎?另一方面,大众的感受对于大学发展过程具有解释意义。据涂尔干所说,大众之于教育的心态往往作为一种集体表象以另一种方式记载着教育的发展过程,而且这种集体表象可以起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和教育的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整个社会世界的基础。^①在此意义上,凭借着心态或集体表象,我们就可以集中讨论大众对大学的认同的建构过程和状况。处于同一个时代里的大众及其对大学的感受一方面是大学发展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大学得到信息反馈的一个重要机制。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全面理解大学及大学问题的一个依据。现今我们理解大学发展中所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往往囿于大学本身局限而做的思考,实际上这些问题大都不是孤立的来自大学本身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出自于大学与大众的关系当中并在其中衍生出来的。

以往对大众之于大学的感受的忽视,并不意味大众的感受就不存在或者就可以熟视无睹。我们完全可以尝试着探索与大学发展相伴的大众历来所形成的感受及其积累状况在现今人们对大学感受情形的影响与意义到底有何关系,这是当下分析大众与大学关系特别是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资源,它有助于将当前的问题放置于历史视野去思考。这意味着在探究大众信任大学的问题时,也应将信任问题的触角延伸到大学历史当中去,依赖从中国大学一开始形成到如今与大众的关系状况作为基础。因为所有有关信任研究的诸多学科已取得共识,认为信任从来都是关系问题。因此对大学与大众关系的历史梳理是分析信任问题不得不做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信任本身也是一个历史依赖的过程。依照卢曼的论断,信任是主体基于对过去可靠性的判断之上,然后着眼于对当下与未来的决策。这意味着没有建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和把握,付出信任是非常艰难的。^②是故,当我们将要探究当前大众信任大学问题时,依照信任的这种特点就应当理解过往人们之于大学的态度状况,方能对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入。

从另一角度来说,大学本身作为人类知识集聚地和知识高地,它与大众之间存在双重“距离”。从抽象意义上说,大学占领人类社会知识领域的制高点,它所担负的传授高深学问与产生新知识的功能,使其与普通大众间天然存在一种无

①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

② [德]尼古拉斯·卢曼. 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6

形的“距离”。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大学从其发轫到当下的发展无不与城镇有着不解之缘,这对于居于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的更大块土地上的乡村人来说,大学给他们的距离不再单单是抽象感觉了,而是触手可及的地理距离。这两种意义上的“距离”对于我国更具特别意义。我国拥有 13 亿人口,而位于异地的大学以及居于其间的知识精英却相对而言是少数。占这个国家人口多数的以数亿计的人口出于对知识的向往和热切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强度使抽象的距离变得更具扩展性和突出意义,那些居于乡村的近 10 亿人口与占人口少数的大学人之间的数量对比,以及二者之间的交往方式使乡村与大学之间的地理距离也更加明晰可见。

事实上,从我们所经验到的社会事实则更能强化大学信任问题出场的合理性。笔者所要研究的大学信任问题不仅仅依托于纯粹的理论构想和推断,而且还具有鲜活的实际生活与事实作为问题提出的依据。这个事实就是:据一些媒体报道在我国大众与大学之间已经出现了信任迟疑的端倪,并导致了一些相应后果;而这些后果往往影响深远但却不易被人们觉察:正是因为这些后果的与众不同凸显了笔者所研究问题的必要性。

在我国,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过去大学拥有非常高的信任度,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人们对大学的信任却出现了迟疑^①。这一现象在中国乡村表现尤其突出。例如,一些农民家庭常常倾全家之财甚至是不惜举债来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四年大学就读结束后却发现孩子找一份工作极其不易,有的毕业生甚至工作最终也没有着落,又重新回到农村,有的为顾及“脸面”选择留在了城市但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劳力去打工,有的甚至参加了传销组织。2009 年 4 月重庆市涪陵区出现了一万多名高中生放弃了高考的现象。不少学生家长算着“教育账”:培养一名大学生一般要 14 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教育投入至少得 5 万元。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起薪按照 2000 元计算,除去生活费,每月存款 500 元,至少 8 年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即使年收入在 5 万元左右,收回成本也要 5 年。而教育投入最多的是大学阶段,孩子考不上好大学,真不如早点就业^②。另据报道,近年广东农村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意愿也在降低,因为在他们看来读大学就是一种投资,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但“毕业相当于失业”的现状,让他们觉得投资风险太大——那么高的投资,回报却可能为零。他们中的不少人出现这样的心态:孩子高中也别读了,成绩不好,考上大

① 孙志国.信任的危机[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178

② 张志超.重庆上万名学生放弃高考引发读书无用论激辩[EB/OL].<http://www.sina.com.cn> 2009-04-19

专,跟读技校没什么两样,技校学费少,国家还有补贴。多数村民认为:“以前有个大学生,一家人基本就脱贫了;现在有个大学生,可就要返贫了。刚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趾高气扬,满脸欢喜,到了毕业的时候,学生、家长全都垂头丧气。”^①所有这些导致了广大乡村学生与家长逐渐对处于城市里的大学的失望与信任不足。

本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有关大学教育产业化的呼声迭起,尽管这一情势后来被遏制,但它却深深影响了大学行为及人们看待大学的传统视界。在这个浪潮中,诸多大学逐渐被催醒并找到理由将经济理性作为其发展诉求的一个关注点,这使得大学的一些社会行为与人们对大学历来所形成并保持的良好印象之间产生反差。早先,在人们心目中作为诚实守用、创生知识与占领道德制高点、作为社会发展灯塔的大学,却显现了与其身份与角色迥然有别的社会行为,如乱收费、招生欺骗、背弃承诺、教师失德、等等,这些行为与乱象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形象,导致大学信用陡然下降。从传统和社会意义上说,大学本应属于典型的“可以付诸信任”的社会组织,它被期望是公正、守信,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其行为是以社会责任、学术责任为出发点的。一旦人们对大学的态度出现了认知上的错位,则会导致信任迟疑,而信任迟疑则会发展成“不信任扩散”,因为信任存在一种“晕轮效应”。

更进一步来看,中国大学近几年的扩招,使在校大学生失却了作为大学主人的身份感觉,大学与学生之间关系出现变化。由于扩招,校园里人数剧增,大学无暇对众多学生施以人文关怀和个别教育与关照,却多了几分工具性看待与批量培训。大学所能固守的宁静已荡然无存,这里的氛围与大学外涌动的市场热潮几无区别。在学生的心目中所持有的对大学虔诚崇敬的意识却已演变成为对必要的职业培训的无奈追求。大学已经从以往神圣的神坛上跌落下来,信任还能在学生心中持有什么?对大学的信任感不足和失望情绪一旦产生,大学身上的美学光芒和无限诗意就会骤然消失。

基于上述理论与事实的耙梳,我们就获得了将大众对大学的信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更细致一些来讲,笔者所要做的大大学信任研究将重心主要放置在判断人们信任大学的状况,尔后再探讨这种信任状况得以发生的缘由,即找出理由来解答人们是凭借着什么样的依据来向大学提供信任或不提供信任的,基于此则更深一步探究这些形成信任或不信任的基础对于指导人们与大学交往

^① 黄学佳、黄廷首.就业愁云密布“状元村”萌生读书无用论[N].南方农村报,2009-4

中是否还存在其他亟待关注的问题。为更确切地掌握人们对大学感受的真实信任状况,笔者认为还是要回到现象本身去,深入实地把脉其间的真实原委,以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为此,笔者选择了一个特定地域来实地考察人们对大学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还时刻注意把对大学的理解与大众的感受紧密联系起来,从大众的视角来铺陈说明问题。这种将实地考察与大众视角结合起来的办法,有望能更好地阐释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大学信任问题。

二、大学社会信任的研究意义

首先,信任问题是由“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是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也应回应这一问题,作出自己学科的特色研究。“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①社会已出现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特征。同时人们的信任范围也从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状况扩展到对“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另外,当代社会学家还认为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高速流动、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之上。在这方面吉登斯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信任是建立人际信任的基础上,而现代性社会的到来,时空“脱域”现象的出现,使得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过渡到对不确定的时间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为了消除时空的不确定性,减轻社会交易的成本,现代社会必然要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系统,依据对系统的信任来克服或避免因不确定的时空所导致的不信任现象,这便使得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任形式^②。大学对大众来说是基于“距离”之上的“陌生者”,人们对大学的信任显然是不可能囿于特殊信任,即亲缘、地域或熟人信任,而是扩展到抽象信任,即吉登斯所说的系统信任。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对信任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系统信任研究的一个应用性研究,如果将这一研究深入细致地进行下去,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尝试进行对信任研究的一次“探险”,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学术积累。

其次,研究大众给予大学信任与不给予大学信任本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从大众角度来说,人们向大学供给信任可从信任中受益。因为社会学

① [美]巴伯.信任的逻辑与局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2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35

理论认为信任可以代替社会控制的资源,有助于节省交易成本。在个人与大学的交往关系中,信任付出就意味着个人不需要监督大学及大学中的知识精英,个人也不必强迫教育精英去做个人期望他们做的事情或寻求第三方执行者的要求,信任可以作为节省成本的手段起作用。不但如此,信任还为个人开放了选择限度,而且在个人与大学之间可形成默契,使个人求得放心并具有安全感。从大学的角度来讲,作为被信任者,信任也是极端重要的。被信任等于值得信任,这种信任可能被用来消解自己的错误、减轻被怀疑,并且给以信任所掩盖的大学推行的革新、创新开辟广泛回旋的余地,也就是说大学在革新路上做出可能的出格之错,却由于信任赢得个人的理解和谅解。另外,能获得信任对大学来说,也能带来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起创新和新的探索,而这又引出大学对有利发展机遇的发现。而在没有信任时,这种发现可能被错失。由此可知,信任可作为一种资本积累起来,它为大学在更大范围的行为开放了更多的机会。相反,信任的缺乏往往会使得大学备受社会压力,导致大学习惯性地墨守成规,将其掩藏在许许多多规则和律令背后。这就意味着信任必须持续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它使大学对值得信任的自我表现做出承诺,如果大学要想摆脱与放弃这种承诺,它将面对发展的极大困难。因此,对大学来说要赢得信任,就要做好自我表现,和大众之间互换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势必要加强与大众沟通的努力,这种努力以及与大众建立的长期良好社会关系对大学来说既是一种发展的机会,也是一种制约;因为它必须考虑守信与遵守承诺,信任此时成为一种责任工具在起作用。从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来说,信任的意义体现在信任所具有的广泛功能上。

其一,信任可以作为保持高等教育秩序的重要机制。正如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在他的社会交换理论中所说的“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①。道德哲学家鲍克则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公益,如果它被破坏,社会就会混乱和崩溃”。巴伯则干脆讲:“信任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般功能,并且为不断相互作用的行动者和体制提供认识和道德的期望图式。”^②

其二,信任可以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或作为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背景基础。特别是在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必须依仗权力——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人们必须信任权力,因而这种信任赋予使强有力的控制成为可能。

其三,在教育系统内信任可以表达和维护团结。信任是创立和维护团结的一个综合性机制,大学与大众之间的信任表明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把二者紧

① [美]彼得·M·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55

② [美]巴伯. 信任的逻辑与局限[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2

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教育系统内,信任不是一个“零一整”问题,而是在一种关系中为涉入的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因此可以说,信任是一种“公益”。对社会生活来说,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将社会信任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显示了信任对与国家、社会、家庭的重要意义。而培植大众与大学间的良好信任关系,对于培育社会信任与公共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和基础性的社会工程。正是基于以上这些重要理由,方显得对大学信任研究的格外必要。

再次,通过研究人们对大学信任状况以及信任水平程度,可以提供一个考察大众与大学的合作意愿的中间环节。因为,信任毕竟是社会心理得以展现后的一个结果,人们对大学供给信任的程度与水平,往往可作为表达大众与大学合作情况的“社会晴雨表”,通过此,无论是大学管理者还是管理大学的政府部门在检讨各自所做出的大学教育政策时就会有可参照的依据,从而使大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大学的各级管理部门做出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服务。

三、相关研究资料综述

尽管对信任的研究在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已在近年成为“显学”,而在教育学视域内对信任问题的关注却并不怎么热烈,遑论专门针对大众信任大学问题的研究了。为能将研究大学信任问题的理论梳理更为全面,这里将整个教育领域内对信任研究的所有情况都汇集在一起考察。教育领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纪后期才兴盛起来,只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各异,从而使这个领域的信任研究理论纷呈。依照研究视角来梳理,可以将这些理论旨趣归纳为三类。

(一)从关注大学发展的视角探讨信任对于大学内部管理的意义

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探讨大学自身问题所导致大众对大学失去信任的情况。如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认为,大学存在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源自两个原因:一是大学运行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失范等不良现象导致大众对大学信任迟疑。二是由于大学专业性运作造成外界对大学认知的不足,这种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学向外界做出解释其运行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为此,他指出大学在享有学术自由的同时更应担负起学术责任,一方面通过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另一方面大学人要养成诚实品质来重新赢得信任。Wayne A. Jones 探讨了大学组织模

式与教工向其领导者供给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用以大学领导者改善其领导实践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能很好进行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①。

其二,大量研究教育机构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如 Regina Dawn Woods 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大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际信任问题,提出了改善双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②。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K·W·施威厄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在多所大学创立了信任研究中心,并在信任研究方面取得了西方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业绩。施威厄先后出版了许多研究教育信任问题的专著,如《教育关系中的信任》、《信任——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师生互动——学校中教与学的教育心理学观点》,以及最新出版的《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信任》等。在这些著作中,施威厄都将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组织中的人际信任问题,来深究信任对于学校、对于班级建设和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的意义,他指出:“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对人的信赖之中蕴含着学校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巨大机遇。师生间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及早地认识问题并共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信任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班级与学校氛围。”^③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在其《大学教师的技巧:论课堂教学的方法、信任与回应》一书中以同样的视角探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与技能来看待^④。

(二)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过程探究信任的功用问题

Lesley Le Grange 撰文探讨社会信任对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作用^⑤。Mike Bottery 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与大学教师之间的信任问题,以发现造成政府和教师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哈耶克指称的福利国家权威主义过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情有独钟

① 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 8, No. 3, 2002: 10-11

② Regina D. Woods. Th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ust, and Tolerance of Ambiguity[R].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2004: 2-45

③ 转引自俞可. 施威厄及其教育信任研究[J]. 上海教育, 2004(2): 33

④ [美]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 大学教师的技巧: 论课堂教学的方法、信任与回应[M].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30-136

⑤ Lesley Le Grange. The Role of (Dis)Trust in a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ject [J].

的市场化喧嚣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管理机构对大学和教师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他们的聘任与留用问题^①。

(三) 研究学生(大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社会学家科尔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就披露了美国公立学校在实施教育的机会均等等政策的低效和无能,大众对学校的信任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对学校实行的政策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其他制度丧失信任的情况蔓延造成的^②。他还指出学校失去大众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计划发行教育债券和增收教育税的议案屡遭否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教学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 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 和 Glenn A. Bryan 三人提出假设,认为大学的专业程度、合作意向、互动效率、利好取向、释疑能力、信息交流机制、守约状况和道德理性等因素是学生信任大学与否的八个根源。他们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假设。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建议,大学要对这八个方面采取相应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大学也方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财政的支持^③。Megan Tschannen Moran 和 Wayne K. Hoy 在检视了信任对学校的重要性后发现:美国大学过去一直承担太多的价值承诺,而在美国这个价值多元的国家这些承诺又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这使得大学由于无力将其所承诺的革新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倍遭大众的非难,这导致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急剧增长。他认为缺少信任使许多进行当中的教育改革面临巨大障碍,因为所有的教育改革都需要强烈浓郁的信任氛围作支持;同样,大学教师改变其教学技能的教学改革也需仰仗信任来实现。他们还分析了大众信任大学的构成因素、基础和信任度等问题,并对如何创生、维持和修复信任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在信任研究问题上,他们总结有两个路向可以深入下去。

第一,为在组织层面分别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层与学校管理层、政府教育管理层与校长、学生与学校、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

① M. Bottery. The Management and Mismanagement of Trust[J].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② [美]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 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26

③ 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 & Glenn A. Bryan. Student Trust and Its Antecedents in Higher

第二,是在组织内部研究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①。塞浦路斯的 Paul T. Gibbs 撰文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学为赢得财政支持和迎合社会的需要将更多地提供技术性产品,这势必造成大学以牺牲自我为手段来顺从社会要求和实现自我私欲的膨胀从而舍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审思、致学和反思的本性。作者力倡使大学回归到完全不同于市场化所要求的大学发展之路,那就是让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一起追求他们本该担当的责任和自主生存的方式,而不再迫于经济压力蜕变成“人造”的存在。他认为这或许在商业主义的大潮中是不合适宜的,但这样能将大学从被经济利益所诱拐中摆脱出来,而将大学回归到时时探寻人本身这一中心问题上来。他还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猎寻各种社会资本,而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唤起学生和教师热切地探寻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为此,学生与教师应通过创建广阔的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培植信任来作为大学生活的追求,将信任作为学生和教师的一种存在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的发展提供支持,大学也不至于再度被市场诱导的虚无主义追求所累。^②

在国内,目前尚没有专门的著述来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特别是关于大学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只有较多的学术论文来针对中小学和学术组织(机构)内部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将这些研究综合起来分析,它们所秉持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研究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内的人际信任关系,这些研究往往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信任,即探讨如何在学校主体之间,如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领导者与教师、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培植与运用信任以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度。如石艳基于对人际信任的关注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危机、信任类型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等问题。王福友则探讨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其研究立场也是基于学术组织中的人际信任。正如他所指出:“学术组织中的信任是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中以相互信任对方为基本准则的交往和共处行为,是学术道德的基础。”^③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探讨了学术组织中的信任的来源、信任的实现条件以及信任对于学术组织的意义等问题。李晔的博士论文《师生信任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则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师生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是增加师生沟通、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是进行有效教育

① Megan Tschannen Moran & Wayne K. Hoy. A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Nature, Meaning, and

② Paul T. Gibbs. Trusting in the University: The Contribution of Temporality and Trust to a Praxis of Higher Learning [J]. Journal of Leadership, Vol. 4, No. 6, 2002, pp. 110

③ 王福友. 学术组织中的信任[J]. 高等教育研究, 2005(2): 43